

学科综述

2017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综述

贾中正*

【摘要】本文从如下方面梳理了2017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西方国际经济理论批判,国际价值论与不平等交换,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文献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和研究体系,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新时代

一、引言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存在不确定性,完善全球治理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美国挑起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风潮盛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普遍收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压力,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增长任务艰巨,与此同时,英国脱欧进程一波三折,中东等热点地区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解决方案悬而未决甚至有所倒退,面对这些现实难题和挑战,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结合国际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此,本文基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交叉研究的标准,选取2017年刊发在学术期刊上有关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研究文献,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归类 and 总结,以期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和解决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具体来看,本文分别从《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经济》、《管理世界》、《国外理论动态》、《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欧洲研究》、《金融评论》、《外交评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代经济研究》等期刊选取62篇文章,并选取3本国内外专著,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对西方国际经济理论的批判、国际价值论与不平等交换、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具体参见表1。

* 贾中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jiazz@cass.org.cn。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并自负文责。

从期刊来看,《马克思主义研究》以16篇的数量稳居第一,约占刊发总数的26%;其次为《国外理论动态》,刊发了6篇,约占总数的10%;《中国社会科学》刊发了5篇,约占总数的8%。《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China Review》等也刊发了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献。除此之外,还有国内外学者出版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专著,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将马克思主义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好地结合起来,针对国际现实问题,提出富有洞见的观点,将有助于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从议题分布来看,有关对西方国际经济理论批判的文献最多,为15篇;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和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有13篇;第三是有关国际价值论与不平等交换的文献,有11篇;最后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文献,有10篇。这些文献研究议题广泛,研究视角新颖,且创新点较多,对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

表 1 2017 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期刊文章的分布 单位: 篇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国际理论发展	对西方理论的批判	国际价值论与不平等交换	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合计
中国社会科学	1	1		1	2	5
经济研究	3					3
世界经济			1	1		2
管理世界	1					1
世界经济与政治		2	1			3
国外理论动态			6			6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	1	1			4
国际安全研究		1				1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1		1
金融评论				1		1
中国工业经济	2			1		3
欧洲研究					1	1
当代经济研究				3		3
江西社会科学					1	1
财贸经济			1	1	1	3
马克思主义研究	4	1	5		6	16
外交评论		1				1
东北师大学报				1		1

续表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国际理论发展	对西方理论的批判	国际价值论与不平等交换	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合计
经济问题探索				1		1
人民论坛		1			1	2
苏州大学学报		1				1
China Review					1	1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1				1
合计	13	10	15	11	13	62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作用（程恩富等，2017）^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张宇，2017）^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经济思想。王东京（2017）^③认为，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主线，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关于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确定了基本范式，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肖贵清、田桥（2017）^④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具有共同的指导思想、价值准则和理论精髓，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周建超（2017）^⑤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视角研究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它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关于

① 程恩富等（201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 张宇（20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经济研究》，第5期。

③ 王东京（2017）：“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管理世界》，第11期。

④ 肖贵清、田桥（2017）：“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1期。

⑤ 周建超（2017）：“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下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1期。

资源配置的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政策发展了社会扩大再生产理论。杨春学 (2017)^① 认为, 公有制理论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经典的理论结构以其“纯粹形态”仍然充满吸引力, 但是基于苏联模式的公有制理论正在失去其现实基础, 而中国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公有制理论。“以公有制为主,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体制绝然不同于苏联模式中的公有制。二者的差异不是边际意义上的变化, 而是带有实质性意义的变革。这种变革正在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吕政 (2017)^② 认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价值规律理论, 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的认识, 并稳妥地推进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荣兆梓 (2017)^③ 认为, 当代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决定市场经济、资本关系的同时存在, 社会主义既不能绕过市场经济, 也不可能“超越资本”, 资本包括私有资本和公有资本两种历史形态。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内在矛盾展开的必然结果, 是迫使劳动者个人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的经济关系。公有资本的强大积累功能与增进人民福祉结合, 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因。公有资本的创新动力及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免疫力”, 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冲破资本主义桎梏, 持续发展生产力的巨大能量, 它证明了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法性。

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 除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 还要关注其在宏观经济、社会公平和国家治理层面的“正外部性”。20世纪后期, 西方国家采取的私有化行动, 在短期看有一定的积极效果, 但从长期来看却严重伤害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而言,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大幅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显著增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国辉, 2017)^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 国际会计准则因具有严重的顺周期效应而备受指责。该准则下的财务报表混合列报会计数据和金融分析数据, 导致财务报表的公益作用大为减弱。周华等 (2017)^⑤ 运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分析发现, 公允价值会计和资产减值会计均有弊端。刘志国 (2017)^⑥ 认为, 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路径是多样的, 但最根本的途径是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在创新发展过程中, 国有企业应发挥引导和控制作用, 这是由其地位和使命所决定的。国有企业必须面对来自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压力, 而要实现自我发展也必须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

正确地进行国际比较, 除了要遵循正确的基本原则外, 还要坚持正确立场, 以防止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刘光峰 (2017)^⑦ 认为, 应遵循事物的可比性原则, 遵循事物的本质性比较原则, 端正比较的政治立场, 反对视贪腐和专制独裁为中国特色、反对把西方民主制度视为

① 杨春学 (2017): “论公有制理论的发展”, 《中国工业经济》, 第 10 期。

② 吕政 (2017): “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工业经济》, 第 10 期。

③ 荣兆梓 (2017): “生产力、公有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评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容论”, 《经济研究》, 第 4 期。

④ 于国辉 (2017):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 《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 11 期。

⑤ 周华、戴德明、刘俊海、叶建明 (2017): “国际会计准则的困境与财务报表的改进——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 第 3 期。

⑥ 刘志国 (2017): “创新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策略选择”, 《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 1 期。

⑦ 刘光峰 (2017):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解读”, 《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 6 期。

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反对夜郎自大等错误观点。通过国际比较,可以更好地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国际比较和借鉴视角来看,李燕和维尔金斯卡娅·塔季扬娜(2017)^①认为,中国新经济发展方略对与中国发展模式相近的白俄罗斯有重要启示,中国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成功经验值得白俄罗斯借鉴,中国新型全球发展理念为白中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王艺明(2017)^②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试图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的形成机制,以及这种分配不均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论支持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家的动机在于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价值”、“积累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资本家特有的行为”、“积累的源泉仅仅来源于剩余价值”以及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等重要理论判断。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1940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情况,对于分析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条件下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的成因和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三、国际价值论与不平等交换

(一) 国际分工、国际价值与不平等交换

马克思主义认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际分工日趋细化,从而将世界各国都卷入到分工体系中。现代国际分工表现出多阶段、多层次的结构,因而各国的比较优势发生了迅速改变,使各国劳动力的就业受到较大影响。这不是一个国家因为国际贸易或贸易政策所产生的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威胁,而更多的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分工全球化的必然。佟家栋(2017)^③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在如何因势利导,解决这些过渡性问题上。目前的现实是,国际经济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脆弱恢复期各国开放政策的新态势。胡方(2017)^④从国际分工、剩余价值与贸易利润的相互关系角度,通过建立和扩展马克思国际价值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各国参与国际贸易活动时的利益得失及相关政策措施后发现,相互贸易的国家极力追求贸易利润,但其结果具有差异:一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润的同时,另一国会出出现贸易利益的损害。某个国家单独采取关税政策时,该国将获得更多贸易利益;两个贸易国家同时采取关税政策时,会出现纳什政策博弈,各国通过这种政策博弈获得相关的利益。

国际价值量的决定机理一直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国际经济领域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刘晓音、宋树理(2017)^⑤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利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模型,建立用于任意国际交换商品的单位国际价值量与其国际生产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证明无论是从静态的生产过程还是从动态的再生产过程来看,都可以确定任意国际交换商品的唯一单位国际

① 李燕、[白俄罗斯]维尔金斯卡娅·塔季扬娜(2017):“白俄罗斯学界对中共十九大的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

② 王艺明(2017):“经济增长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经济研究》,第11期。

③ 佟家栋(2017):“分工与国际经济保护主义:驳‘中国威胁论’”,《世界经济》,第6期。

④ 胡方(2017):“国际价值、贸易利益与经济政策”,《当代经济研究》,第7期。

⑤ 刘晓音、宋树理(2017):“基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模型的国际价值量决定机理研究”,《世界经济》,第10期。

价值量决定方程。任意国际交换商品的单位国际价值量决定方程结合其行业国际价值总量决定方程，可以说明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任意国际交换商品的单位国际价值量的形成机理，并且可以更加合乎逻辑地解释钻石和水的价格决定、国际不平等交换等“经济之谜”。孙业霞（2017）^①认为，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跨国企业越来越多，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的形成主体以国家为生产部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考察企业作为国际市场主体时国际价值的微观形成机制更具有合理性和实际意义。企业作为国际价值形成的微观主体，可以比较生产商品的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来选择是否进入国际市场，从微观角度来看国际市场存在三种不同的剥削形式。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中国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应该考虑企业实现国际价值的因素，也要避免发达国家对我国财富的掠夺。

不平等交换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现实表现。随着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看似透明开放的国际交换表象下，中心国家利用国际不平等交换剥削非中心国家的本质并未改变。王雪婷等（2017）^②基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视角，选取1999—2015年180个中心国家与非中心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现，两类国家间单位劳动价值创造率差距较大，国际不平等交换长期存在，非中心国家“隐形财富流失”严重。他们认为，为从根本上减少国际不平等交换带来的不利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非中心国家应高度重视本国商品品牌建设与国家软实力提升，鼓励本国企业技术创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并适当缩小工资差距。与此观点类似，王智强、李明（2017）^③认为，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垄断力量的国际差异导致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国际生产价格和国际垄断价格。按照国别价值的转化形式进行等价交换，一国用某种商品换回的劳动量不再等于生产该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剩余价值从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有机构成低、垄断力量弱的国家向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有机构成高、垄断力量强的国家转移。他们采用1995—2011年54个国家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剩余价值国际转移率与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垄断力量存在正向关系。剩余价值国际转移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转型升级，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劳动异化的程度，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和贫富差距。

（二）马克思世界货币理论及其应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30、31和32章中深刻地分析了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问题，其理论包括生息资本在有价证券形态上的积累，商业信用的积累，生息资本的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借贷货币资本形式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资本、货币、借贷资本之间的转化等。曾康霖、罗晶（2017）^④研究认为，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的启示包括，供给于社会的货币必须区分为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作为货币资金的货币和作为商品的货币，无论哪一种货币的需求量都是有限的，无限地供给

① 孙业霞（2017）：“微观视角下国际价值的形成与国际剥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② 王雪婷、孟祥宁、徐茜（2017）：“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视角下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研究”，《当代经济研究》，第11期。

③ 王智强、李明（2017）：“剩余价值国际转移及其经济效应分析”，《当代经济研究》，第12期。

④ 曾康霖、罗晶（2017）：“马克思的货币资本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理论研究”，《财贸经济》，第7期。

货币必然产生负效果等, 这为研究资金是否进入实体经济以及为何未进入等现实问题提供有力支持。还有学者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对比研究了世界货币理论。马克思经济学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构建了世界货币理论。从世界货币形式演变的历史事实出发, 该理论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一般性同世界的特殊性联系起来, 阐述了世界货币改造的前提、世界货币形式演变及内在逻辑, 分析了其对生产关系的空间影响, 揭示了世界货币的内在矛盾。姚鸿韦 (2017)^① 在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世界货币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世界货币矛盾和内容特征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发现, 马克思经济学的世界货币理论是全面深刻的, 具有系统性和统一性。相较于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货币理论,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对世界货币根本性问题的探究更具预见性。世界货币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无法摆脱其内在矛盾, 因此, 人民币在国际化发展道路上必须重视世界货币的发展基础和内在矛盾。

汇率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价格, 是有效配置国内国际资金的决定性因素。林楠 (2017)^② 参照马克思“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的分篇顺序研究认为, 从本质上看, 汇率是“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相对于西方汇率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汇率分析在三方面能够较好地实现“一体同观”: 一是开放经济随时间推移的实际收入决定和消费配置, 二是纳入时间维度并兼顾商业周期与经济增长, 三是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相协调下汇率与国际收支综合考量。如何在人民币国际化新背景下结合“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汇率分析新框架, 将成为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三) 对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示

在马克思的供给理论中, 供给起决定性作用, 需求决定了潜在供给的实现程度。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的规模及其增长, 在既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 取决于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论述, 经济结构关系取决于生产关系或生产工具和人的分配(配置)关系, 因此, 不对生产关系或体制动手术, 经济结构是难以调整到位的。方福前 (2017)^③ 认为, 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和论述对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供给体系的协调性、高效性和高质性。“三去一降一补”最终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且要使供给体系的创新空间更加宽阔, 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充满活力。金碚 (2017)^④ 认为, 马克思经济学是以价值论为主线、以供求论为辅线的严密学术范式体系。基于价值论范式, 所谓供给侧就体现为提供效用的实质供给、提供有用产品的实际供给、提供以使用价值为前提。而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交换价值名义供给, 以及以信用货币标示的无使用价值之物的虚拟供给。简言之, 实质供给的核心意义是“提供有用性”, 实际供给的核心意义是“提供有用物”, 名义供给的核心意义是“提供价值量”,

① 姚鸿韦 (2017): “世界货币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经济问题探索》, 第6期。

② 林楠 (2017):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汇率分析: 基于文献的评述”, 《金融评论》, 第2期。

③ 方福前 (2017): “寻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 《中国社会科学》, 第7期。

④ 金碚 (2017): “基于价值论与供求论范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析”, 《中国工业经济》, 第4期。

虚拟供给的核心意义是“符号值增殖”。供给侧失调的价值论性质“内嵌”在供求体系中。其主要表现是结构失衡和质效缺陷。供给形态的演化与异化的过程发生了“目的”与“工具”的三次颠倒，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产生。人类无论怎样生活在充满货币幻觉的世界，无论复杂的货币世界把经济关系编织得如何复杂，甚至让人类完全颠倒地看待这个世界，分不清“目的”与“工具”，但是，一旦供给体系尤其是实质供给问题凸显，货币性（需求侧）政策效率递减，人们就不得不回到经济的最实质其实也是最本原的层面，从实质供给与实际有效供给上寻找出路。这就是中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缘由。

振兴实体商业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重要途径，随着大众消费方式和观念的不断更新，流通内涵的不断丰富，实体商业转型的任务更加紧迫。传统流通理论并不能对当前实体商业面临的困境给予满意的解释和引导，孙鹏（2017）^①以马克思流通观为起点，重新审视了流通过程中价值运动的规律与原理，尝试提出引致价值概念用以弥补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间的断点，为实体商业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其借鉴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对规模以上零售业企业财务数据进行挖掘，发现和计算出中国零售业的有效引致价值率，并对比中美上市实体零售企业盈利能力的差异，指出中国实体商业引致价值创造能力较低是导致经营困境的重要原因。实体商业应从供给侧发力，通过价值重构和再造，向综合性服务商转型。

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就是系统地阐述国家对外行为如何导致国际合作与冲突，从国家利益来阐述国家行为的根源。西方主流理论有的是从内部阐述国家行为的根源，有的是从外部结构阐述国家行为的根源，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从这三个角度阐述国家利益，分析国际的冲突与合作。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西方主流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坚持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历史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生产关系来阐述国家利益的形成，并且强调外部结构与国家是相互决定的结构—施动者之间的关系。李滨、杨蓉荣（2017）^②认为，就国家内部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认为国家具体历史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具体内容。就外部结构而言，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具体的世界性生产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具有时代性的结构特征。这种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分析国家利益和世界结构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只有坚持这一方法，我们才能认识国家利益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不同世界秩序的时代性，才能发现不同时代结构—施动者之间具体的互构关系。

但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总体上呈停滞状态，既有理论无法全面有效地解释现实国际关系，在预测方面更是有心无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特别是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使其能够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可靠路径之一。王存刚（2017）^③认为，依循这一路径，研究者应当从当今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出发，立足跨国关系性状态这一逻辑起点，

① 孙鹏（2017）：“以价值重构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基于引致价值分析”，《财贸经济》，第7期。

② 李滨、杨蓉荣（2017）：“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期。

③ 王存刚（2017）：“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外交评论》，第1期。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汲取传统研究方法的精髓,不断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努力实现人文和科学两种方法的融和。在系统深入地研究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新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新范式,积极开展学科内部各范式间对话和跨学科对话,高度重视各种地方性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努力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包容性、创新性发展。马克思的国际观是观察和分析国际社会历史变迁和发展规律的立场、方法和观点的集合体,集中体现为对世界历史变迁和世界交往演变规律的基本认知、对国际社会制度变革和主体力量关系矛盾运动的价值判断,以及追求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伦理正义的文化向度。马克思以宏大历史视角探讨了世界历史和国际体系演变规律,并深刻揭示出这一发展规律内在的历史动力和演化秘密,为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时代特征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姜安,2017)^①。相较于同时期及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的国际观以独有的阶级立场和方法论原则,以严谨的思辨逻辑和价值高度,对国际社会的演变规律和内在本质,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进行了科学研究和辩证分析,在国际关系的思想与理论光谱中独树一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创新提供思想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中国的外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从内在理论逻辑上缺少总结,对于其中一些内容分析得还不够全面和充实,对中国外交的实践意义研究比较少,也缺乏同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对比研究。陈宇、张新平(2017)^②认为,我们应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加强对其核心逻辑的归纳和总结,在具体内容上,要继续充实和完善,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系的研究,要注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对于中国外交实践的指导意义,也要加强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比研究。欧阳向英、阿列克斯·巴特勒(2017)^③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包括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安全关系三个方面,理论上应随时代的发展而补充新内容,实践中应对现实的国际问题给予有效的解读与回答,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新变化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研究了国际安全和太空安全的新范式。欧阳向英(2017)^④认为,独立自主与开放共赢、坚持国际民主和不干涉别国内政、保卫世界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是国际安全关系的基本准则。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要与各国一道,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徐能武、刘杨钺(2017)^⑤认为,太空安全缘于各国发展太空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交往互动的社会实践。太空安全互动并不是单方面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的体系外变量,太空安全实践的社会过程内嵌在国际体系宏观社会进程里,共同构成了国际政治演化的内生动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集中代表者之一的太空技术

① 姜安(2017):“马克思的国际观及其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

② 陈宇、张新平(2017):“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第1期。

③ 欧阳向英、[加]阿列克斯·巴特勒(2017):“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期。

④ 欧阳向英(2017):“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观”,《人民论坛》,第10期。

⑤ 徐能武、刘杨钺(2017):“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太空安全研究新范式”,《国际安全研究》,第2期。

以及支撑这种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太空安全演变中的根本性变量。“技术－权力－观念”的辩证互动蕴涵着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的内在机理，预示着太空安全持续进化到包容、普惠、和谐状态的前景。在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太空主体安全互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冲突与合作的关系状态。太空安全进化冲突抑或进化合作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主要取决于由太空技术决定的体系暴力控制、政治认同增强和规范机制的内化和遵循等关键性社会条件。为此，基于“和平发展”理念的既具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太空安全研究，应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权力政治”思维的窠臼，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的研究体系，从而为推动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航天事业发展与太空国际合作进程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还有学者从劳工阶级的视角入手，对民族国家与国际团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现代世界体系视野分析劳工阶级反抗运动的开拓者，其提出的劳工阶级革命理论可以精炼地表述为“工人没有祖国”。汪仕凯（2017）^①继承了这一研究思想，以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为基本线索，致力于揭示民族国家整合劳工阶级从而阻碍劳工阶级形成国际团结的主要逻辑。首先，现代世界体系虽然在劳动分工过程将劳工塑造到相近的位置上，也就是从劳动力市场中赚取工资性收入的雇佣劳动者——劳工阶级，但是现代世界体系也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其次，民族国家的形成将劳工阶级分散到相互分割的政治地理空间之中，不仅民族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会加深劳工阶级的国别差异，而且民族国家的统治策略也会促使劳工阶级积极向民族国家靠拢，从而与民族国家整合在一起。再次，现代世界体系中劳动力商品化的压力和民族国家在劳工阶级内部制造的裂痕，促使劳工阶级不得不主动远离国际团结转而进行界限划分，否则就不可能适应现代世界体系。最后，现代世界体系的维系恰是以劳工阶级的分裂为前提的，所以劳工阶级国际团结的实现必须以现代世界体系的改变作为基本条件和构成元素。另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信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问题进行了研究。Sevignani（2017）^②认为，在信息经济理论化过程中，不应该忽略剥削和对立的社会关系的概念。剥削会在所有互联网用户与通信、监视和分类手段的所有者之间建立对抗。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存亡。严书翰（2017）^③认为，要全面总结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又不要被经典作家针对具体条件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束缚住手脚。要做到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政治经济学体系，需要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当代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两大支柱，也即简单（均衡）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IS-LM理论，它们作为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用数学的逻辑代替经济学的逻辑，用一系列虚构的语义不清的概念和违背基本常识的假设来推导出想要的结论，注定了其

① 汪仕凯（2017）：“在国际团结与民族国家之间——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劳工阶级”，《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

② Sevignani, Sebastian (2017). Surveillance, Classifica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The Relevance of Exploi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s in Information.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 42, No. 1, pp. 77 - 102.

③ 严书翰（2017）：“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兼析要厘清各种错误思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2期。

伪科学性和欺骗性。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以共同富裕、经济安全和经济结构优化为目标,以金融部门、财政部门 and 国有-集体经济为支柱;这三大宏观调控支柱紧紧围绕这三个层次的宏观调控目标,综合运用“国家专卖”、“平准”、“榷商”政策和“国家计划”产业政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不仅要“调”,更重要的是要(在生产规模和产品价格上的)“控”(刘明国,2017)^①。

在话语领域中争夺主导权日趋激烈的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面临西方主流话语强势渗透的“挤压”、在国内大众话语领域中“失语”和国际主流话语领域中“失声”的困境。曾令辉、陈敏(2017)^②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就必须打通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理论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壁垒,构建起既能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又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掌握和运用的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需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话语的新概念新范畴,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表述,建设集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约瑟夫·格里高利·马奥尼、全红(2017)^③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话语,但来自西方国家的外部质疑,尤其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方法论和未来发展的质疑,阻碍了这一话语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普遍认知和认可。对此,中国应强化队伍建设,加深理论研究,进一步廓清、阐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将这一话语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以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建设及其国际化。

总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源远流长,发展前景广阔。中国是国际关系思想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历代思想家的智慧与西方的学说共同奠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学派之一,具有明确的概念、丰富的内涵、显著的特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必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钮菊生、朱新荣,2017)^④。在和平崛起、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在构建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极有可能最终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在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评估方面,门洪华(2017)^⑤认为,应坚持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的时代逻辑演进,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战略辩证法,深入研究党中央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为指引,针对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中等收入陷

① 刘明国(2017):“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兼对当代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

② 曾令辉、陈敏(2017):“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

③ [美]约瑟夫·格里高利·马奥尼、全红(2017):“‘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外部质疑及国际话语建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2期。

④ 钮菊生、朱新荣(2017):“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内涵、特征与发展前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⑤ 门洪华(2017):“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项国际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期。

阱”风险和“修昔底德陷阱”风险，以“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家理想和世界理想双重维度，致力于治国理政的理念创新和思想创新逻辑分析。全面总结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想创新，以五大发展理念、新型国际关系、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内容，以共赢主义为核心指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体系，突显富有时代特色与思想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提炼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标识性概念，彰显了党致力于当代中国破除崛起困境、谋划崛起之后的战略智慧和历史担当。以理念创新和思想创新为指引，构建并完善面向 21 世纪中叶世界大国前景的中国大战略框架。

五、对西方国际经济理论的批判

（一）新帝国主义及其局限性

以戴维·哈维为代表的学术流派认为，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至今没有改变，是一种“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帝国主义”。哈特和奈格里则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性质持有不同于哈维的观点。他们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劳动概念置换为“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并以此作为“阿基米德点”，探索现代世界剥削与压迫的实质，追寻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的可行性路径，从而形成从《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到《大众》和《共有之物》的“帝国三部曲”，阐发了一个逻辑严整、内容充实的帝国理论体系。面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物质劳动论已缺乏解释力，并以非物质劳动论作为分析工具，构建其独特的帝国理论体系。非物质劳动霸权的确立，不仅推动了全球经济的深度一体化，而且导致传统民族国家主权的消解，进而衍生出全球一体化的政治结构。与此相应，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已在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替代传统民族国家主权之职能的“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新的主权形式”，“一个有效地控制全球交流的政治主体，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

尽管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在形式上延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传统与政治旨趣，他们也自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劳动”的发展与创新，但就其实质而言，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本真精神（曹文宏，2017）^①。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精神生产劳动既是物质生产劳动的结果，又是它的能动性方面。哈特和奈格里却认为，非物质劳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现代社会物质生产劳动的驱动力。就此而论，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充其量只能算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非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理论。

本·法恩（2017）^②则在肯定戴维·哈维学术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戴维·哈维作为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其著作《新帝国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方法，因而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资本的内部限度和外部限度是哈维理论的基础，也是理解《新帝国主

^① 曹文宏（2017）：“非物质劳动：一个似‘马’非‘马’的理论命题——基于对哈特和奈格里帝国理论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

^② [英] 本·法恩（2017）：“论‘新’帝国主义”，邹洋、宋阳旨译，《国外理论动态》，第7期。

义》的重要出发点。然而，哈维关于资本的限度的理论并不总是辩证的，客观地分析资本的内部限度和外部限度，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新帝国主义》的贡献及其局限性。艾伦·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2017）^①通过探究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关系来讨论新帝国主义的特征。经济力量拥有使自身与直接的政治强制相分离的特殊能力，这构成了新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这种分离使得诉求无限扩张的资本能够超出领土控制的范围，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维护霸权，以区别于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构建的”所有权。同时，资本主义的剥削也需要政治支持，但服务于全球资本的政治结构不是全球国家而是诸领土国家的全球体系。统一的全球政治权力的缺乏引起了诸领土国家的军事主义，并导致了无限战争和特殊的军事逻辑。在此背景下，基于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对抗性斗争比跨国斗争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不同看法，构成了作者与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之间的区别。

法籍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作为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长期致力于批判全球资本主义、探索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研究。他阐述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两极分化形态，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探讨了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由此继承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思路，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然而，由于固守实证主义的科学观，阿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和结论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也需要我们给予正视（汪信砚、周可，2017）^②。

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方法对美国大选及其价值观问题进行了批判。约瑟夫·G. 马奥尼（Josef Gregory Mahoney）（2017）^③研究了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的胜利是否代表美国价值观的民粹主义转向的问题。虽然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与他的前任们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美国一定会产生制定根本不同的政策的倾向或可能性。特朗普的政治实质上是伪民粹主义，与自里根以来他的每一位前任总统有许多共同之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美国价值观长期以来早已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但直到最近才真正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因为美国工人正在被迫与国际劳工竞争，并不得不对以前主要由美帝国的边缘国家所承受的各种经济危机。人们深切渴望更加根本的变革，在特朗普的政策不可能有助于工人或处境不断恶化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真正的民粹主义有可能到来。

（二）西方经济理论的缺陷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深化，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等传统资本主义理论轮番登场，但其理论解释力却日渐下降，资本主义危机的受害者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开始转向求助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传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远地传播开来，与各种不同的文化、政治和历史背景相互作用，发展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不同解读。

^① [加拿大] 艾伦·M. 伍德（2017）：“资本主义扩张的双重逻辑——从《新帝国主义》与《资本的帝国》谈起”，凭颖译，《国外理论动态》，第7期。

^② 汪信砚、周可（2017）：“从全球资本主义到世界社会主义——萨米尔·阿明思想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

^③ [美] 约瑟夫·G. 马奥尼（2017）：“美国价值观发生了民粹主义转向？——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张永红译，《国外理论动态》，第7期。

理查德·沃尔夫 (Richard D. Wolf) (2017)^① 认为, 马克思主义最有效地凝聚了对资本主义及其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和评论, 凝聚了从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鼓舞的政治运动的成败中汲取的理论和实践教训。对于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理论家和活动家来说, 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宝贵的资源。简·哈代 (Jane Hardy) (2017)^② 也认为,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集中暴露了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效, 包括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持不同立场的激进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和金融工具的滥用是本次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由此带来的消费不足是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 坚持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仅仅依靠加强金融管制等措施只能延缓危机, 但不能彻底消除危机。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2017)^③ 认为, 最近经济新自由主义者与其批判者之间关于国有企业和公有企业地位的争论, 在原则上并不是一场专属于马克思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停留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一种企图上, 也即通过国家全面退出对追求利润的企业活动的管制或控制, 把自由放任原则的病变转化成经济现实。这种把人类社会交给 (所谓的) 自我控制和使财富乃至福利最大化的市场——充斥着理性地追求私利的行动者的企图, 在任何发达经济、甚至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上没有任何先例。

罗纳尔多·蒙克 (2017)^④ 认为,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生产方式”的观点一直是正确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当前社会和自然条件所能容忍的极限。此外, 有学者从马克思最优税收理论视角研究发现, 构建在福利经济学基础上的最优税收理论, 不但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 而且由于其严格的前提假设严重偏离了税制的实际运行状态, 也存在着实践上的限制和约束。刘玉龙 (2017)^⑤ 借鉴西方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逻辑和研究方法, 将最优化方法应用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平衡公式, 以构建劳动价值论视角下的最优税收理论分析框架。其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价值论视角下的效率标准, 并提出可以将引入税收因素的社会再生产平衡公式作为目标函数, 由此最优税收问题就变成: 在实现了 (或一定的) 公平目标的前提下, 应当如何设置税率, 才能保证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所需要的均衡条件。在此基础上其推导出了引入税收因素后的社会再生产平衡公式, 并构架了劳动价值论视角下的最优税收理论框架。

西方主流经济学削足适履式的研究框架表现为, 更关注方法和理论在数学上的精确性, 而不是反映真实世界的准确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漠视和否认, 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公众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误导, 暴露了其理论体系的三大缺陷: 完善预期与完美

① [美] 理查德·沃尔夫 (2017): “资本主义危机与回归马克思”, 史清竹编译, 《国外理论动态》, 第 9 期。

② [英] 简·哈代 (2017): “激进经济学与马克思的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批判”, 王潇锐译, 《国外理论动态》, 第 9 期。

③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第三版)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 9 月。

④ [爱尔兰] 罗纳尔多·蒙克 (2017): “危机之后: 马克思主义与未来”, 刘思妤译, 《国外理论动态》, 第 9 期。

⑤ 刘玉龙 (2017): “最优税收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 《财贸经济》, 第 9 期。

协调,视“外生震荡”为经济变化的动因,“均衡至上”与市场万能。宋小川(2017)^①认为,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这三大缺陷作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首先,马克思揭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流经济理论关于理性经济人完善预期和完美协调的假定。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物的外部而在于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唯物辩证法,更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视“外生震荡”为经济变化动因的唯心主义思维定式的直接否定,对复杂经济动态理论关于经济体系变化和发展动力的探讨具有指导意义。最后,马克思早就科学地预测过,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非均衡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下,会造成两大部类间比例失调,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可见,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出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回归现实。

六、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的困境是“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当代表现,倒退没有出路,因此特朗普的“逆全球化”主张不可能成功,只会使美国陷入更大的困境。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喻示着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另一种全球化方案,一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沈斐,2017)^②。中国已经成功地利用资本全球化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未来也必将利用全球化的中国方案,不断壮大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力量,推动建立一个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 经济全球化的困境与全球治理

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经济全球化模式,一种是20世纪以来西方大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另一种是2013年以来中国倡导的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两种经济全球化都是通过国际分工进行的,却存在着本质区别。朱燕(2017)^③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视角来看,两种模式在增长方式、参与方式、合作方式以及利益分享方式等方面存在区别。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通过国际分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分工协作的生产力效应异化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成果,利益分配不平衡。而在新型经济全球化模式中,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创造的生产力成果由各参与国共同分享,构建起以全人类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命运共同体。

罗斯福新政以后,遭受危机重创的资本主义先后通过建设福利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等政策挽救自己的体制。然而如同英国脱欧一样,随着特朗普上台,新自由主义也无以为继。鲁品越、王永章(2017)^④认为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普世价值”和以“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共同价值”具有本质差别。前者通过形而上学的“个体抽象法”得到孤立个人的抽象共性及其组成的抽象社会,由此宣扬体现“永恒真理与正义”的“普世价值”,即抽象的

① 宋小川(2017):“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三大缺陷”,《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

② 沈斐(2017):“《资本论》视野下的全球化困境与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研究》,第7期。

③ 朱燕(2017):“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视角下两种经济全球化模式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0期。

④ 鲁品越、王永章(2017):“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转换——兼论两种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0期。

“自由、平等、人权”等论调。它一旦施加于不平等的现实社会之上，就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放大器，由其衍生的“国际标准”与“国际范式”则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统治世界的话语权工具，其推行的是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普世价值”的错误不在于承认人的共性，而在于未能揭示人的共性的现实来源。人的现实共性产生于不同层次“命运共同体”中的社会实践，由此形成不同层次的不间断生成和发展着的“共同价值”，引导着人类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对于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原因，相关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经济全球化的困境根源于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及资本主义的实际主导和控制，并由此导致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诸多问题，产生了“新全球化”趋势。例如，戴炳然（2017）^①认为，欧洲一体化引领的地区一体化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阶段。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充斥着多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最为突出的是国家与超国家、扩大与深化两个基本矛盾。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相比，刘志礼（2017）^②认为，习近平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客观趋势、内在矛盾及实践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的，有助于实现经济全球化发展新阶段内涵、范式、话语、机制、路径和价值等的本质超越与系统创新，其中体现的中国智慧、中国担当、中国方案与中国价值，对于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及发展阶段更广泛而深度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其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要素的全球层面的市场化，市场在带来效率的同时，天然地存在着内在的负面效应，其中贫富分化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缺乏适当有效的全球治理，导致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无法实现“帕累托改善”，这也是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主要原因。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目前面临的困难，就要完善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门洪华（2017）^③认为，对新全球化的深刻认识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提出并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的理论创新和战略依托；塑造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标签；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基础性举措。同时注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担当发展中世界和发达国家的桥梁，在全球层面推动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落实，是中国应对治理危机与变革的全球方略。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2017）^④认为，世界体系日趋一体化的同时却又充满了矛盾。全球化新阶段意味着矛盾的深化，这些矛盾同当代世界体系有相同的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结构中，社会力量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并为其意志的实现而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现代世界体系和当代世界体系争夺着霸权。逆全球化盛行反映了全球治理的缺失。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模式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性政治前提，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李滨，2017）^⑤。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加大对私营企业党支部的重建力度。这种以商业为导向的党建确实使中国共产党与私营企业的发展更加紧密相关，从而增强了党组织存在的

① 戴炳然（2017）：“对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的再认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的一些思索”，《欧洲研究》，第1期。

② 刘志礼（2017）：“习近平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

③ 门洪华（2017）：“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

④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帝国主义与依附（修订增补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

⑤ 李滨（2017）：“新全球治理共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

必要性 (Yan & Huang, 2017)^①。未来,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主要战略取向在于:一是深化对新全球化的研究,丰富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二是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夯实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基础;三是确定中国推进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全球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四是稳定东亚诉求,稳步推进东亚治理,提出并落实东亚治理的中国方案;五是抓住重点,在中国熟悉、有优势的经济、金融领域深耕,以此为抓手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门洪华, 2017)。

(二) “一带一路”建设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既对新时代中国开放空间布局进行了统筹谋划,又对中国与世界实现开放共赢的路径进行了顶层设计。目前,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即是切实发挥全球治理良性功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适合方案。庄穆、吴美川 (2017)^②认为,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思想资源。真正共同体、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与公共实践共同构成“一带一路”倡议的合理性基础,揭示了“一带一路”的实质是一种公共性存在,它是作为“我们”的存在而不是作为“我”的存在,沿线国家是作为“主人”的存在而不是作为“客人”的存在,是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的共同实践,而达到以共享为目的的国际协作并有其主权归属的建设成果。李滨 (2017)认为,为了能使“一带一路”倡议普惠于整个世界,可以将这一倡议扩大化,形成一种全球性的“互联互通”计划,通过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球经济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带动发达国家的就业与增长,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和经济发展,克服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各种弊端,实现各国的互利共赢。

马克思的发展共同体思想认为,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发展共同体的过程性、阶段性和目标性统一于人的解放之中,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共同体”。张华波、邓淑华 (2017)^③认为,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启示:即坚持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由人联合体”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坚持人类解放道路的普遍性与其过程性、阶段性和特殊性相统一,以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为旨归。正确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处于起步阶段的现实;坚持“个人自由”和“共同体发展”相统一,始终以人民主体性为原则;坚持理论完善与实践探索相统一,是当前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基础。

作为“中国叙事”和“中国方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有着深厚的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底蕴,更有着浓郁的中华传统和合文化的智慧,同时以其浓郁的全球视野体现着对全球化困境的理性反思和对中国现实境遇的考量,体现了中国将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

^① Yan, Xiaojun & Huang, Jie (2017). Navigating Unknown Wate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ew Presence in the Private Sector. *China Review*, Vol. 17, No. 2, PP. 37-63.

^② 庄穆、吴美川 (2017):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视阈下‘一带一路’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第7期。

^③ 张华波、邓淑华 (2017): “马克思发展共同体思想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

信心和决心（徐艳玲，2017）^①。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标志着人类新文明的曙光（余品华，2017）^②。回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挖掘它的内涵可以发现其包含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全球化时代呼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的整体治理观来统筹、协调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一理念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巨大作用表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国化的新进程。

七、小结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发展学科，兼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它的基本范畴涵盖了世界市场、世界货币、世界经济危机、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国际劳动、国际分工、国际价值等，构建出较为完整的世界体系发展脉络。2017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和研究体系，对推动该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学术议题分布情况来看，2017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多关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对西方国际经济理论的批判、国际价值论与不平等交换、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并就交叉学科发展或国际重大问题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从研究方法来看，很多文献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国际比较、归纳演绎、计量模型、数据分析等方法。

从主要创新来看，一是方法论的创新。例如，有文献引入数理方法，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当代国际现实问题。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例如，很多文献基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从研究结论来看，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坚持这一指导思想，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二是不平等交换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现实表现。剩余价值国际转移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转型升级，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劳动异化的程度，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和贫富差距。三是马克思的国际观是观察和分析国际社会历史变迁和发展规律的立场、方法和观点的集合体，集中体现为对世界历史变迁和世界交往演变规律的基本认知、对国际社会制度变革和主体力量关系矛盾运动的价值判断，以及追求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伦理正义的文化向度。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中国的外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四是新帝国主义关于资本限度的理论并不总是辩证的，客观地分析资本的内部限度和外部限度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新帝国主义的贡献及其局限性。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深化，暴露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等传统资本主义理论解释乏力，资本主义危机的受害者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开始转而求助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

① 徐艳玲（2017）：“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全球化困境下的理论突围”，《人民论坛》，第10期。

② 余品华（2017）：“‘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江西社会科学》，第9期。

论。五是世界体系日趋一体化的同时却又充满了矛盾。逆全球化盛行反映了全球治理的缺失。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治理模式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性政治前提，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切实发挥全球治理良性功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适合方案。

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较为“年轻”的学科，在研究范式、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和工具应用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世界，如何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好地融合，为解决现实国际重大问题提供良策，是本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